



中西文化交流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中国基督教 乡村建设运动研究

(1907—1950)

CHRISTIA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MODERN
CHINA

刘家峰/著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裴义理、芮思委、卜凯等一批来华农业传教士，
以及张福良、徐宝谦、孙恩三等众多中国基督徒，筚路蓝缕，以“宗教家的精神”
去服务乡村建设。他们的事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
都是一笔珍贵的遗产，能给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一些有益的启示。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西文化交流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中国基督教

乡村建设运动研究

(1907—1950)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裴义理、芮思委、卜凯等一批来华农业传教士，以及张福良、徐宝谦、孙恩三等众多中国基督徒，筚路蓝缕，以“宗教家的精神”去服务乡村建设。他们的事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是一笔珍贵的遗产，能给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一些有益的启示。



刘家峰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 / 刘家峰
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01-05976-1

I. 中… II. 刘… III. 乡村—基督教—研究—中国—
1907～1950 IV. 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9865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 www.tjrmcbs.com.cn](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5印张 2插页

字数：260千字 印数：1—5,000

定 价：33.00 元

序

家峰的博士论文是在 2001 年 6 月通过答辩的,但迟在五年以后才得以正式出版。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手头紧迫的任务较多,加以为我分担了大量行政事务工作,对此我的内心总感到有些歉疚。但推迟出版也未尝不是好事。经过五年的不断修订,其中包括许多资料的咀嚼消化和深入思考,现在的书稿比原来的论文已有明显改进,可以说得上是厚积薄发,条分缕析,颇有恢弘气象。

作者在后记中特别提到贝德士文献为他提供的帮助,我很高兴看到“薪火相传”一语再次有所体现。贝德士(M. S. Bates)是我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的业师。他从 1920 年到 1950 年在金大执教近三十年,其历年弟子中陈恭禄、王绳祖、牟复礼(F. W. Mote)、吴天威、陈大瑞等均学有大成。1950 年返美后,贝德士长期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并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韦慕庭主持的研讨课程,直至 1965 年。退休以后,他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即撰写《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1900—1950》这一大型学术专著。根据他的好友 W. O. 威廉的介绍,贝德士为了此书的正式撰写,做了极为严谨而又勤奋的前期工作:一、花费十个夏季与整整七年时间,为几千种相关书籍、文章、宣传品制作索引卡片,并简要提示其价值或预期可能增长的价值。二、为全部《教务杂志》等重要刊物、中国与世界的主要相关会议的文献、中华续行委办会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各类文件及其他文献、部分中国基督教领导人的著作、各个差会、团体、机构的历史、许多相关的学位论文与学术文章乃至未刊文稿、信件与口述历史抄件等等,做了大量的索引与笔记。三、在广泛搜集资料量的基础上,初步草拟了按时期区分的撰写纲要,仅这批手稿就有 3284 页之多。以贝德士先后在牛津与耶鲁受到的良好史学训练以及博学多闻,加上这么细致周密而又严谨扎实的基础工作,人们满心期望他能继赖德烈之后再推出一部中国基督教史的鸿篇巨制。但可惜上天未能假之以年,他于 1978 年猝然病逝,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而我则不胜惋惜地称之为“巨

大的流产”。

但是,贝德士这十三年的辛勤劳动并非没有成绩,他给我们留下一笔巨大的学术遗产。

首先是他的宏大叙事的具体轮廓已经呈现。这批手稿虽然流于零碎片断,但大多能反映出他对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深刻理念。人们不难从中发现他对 1900 年至 1950 年期间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活动中的总体构思。其视野之广阔,观察之细密与态度之严谨,都足以给予我们深刻的思考与启发。正如 M. O. 威廉的评说:“这不是‘差会’的历史或是‘教派’与‘教会事业’的历史,尽管包括了它们全部;这部著作囊括‘基督徒奋进’的整体——外国的与中国的组合更甚于人类的努力。这是在‘中国社会’之内;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关系纷繁的民众之中,他们的机构、他们的历史与文化承续之中,以及他们所曾经过的事件之中。”

也许贝德士本人更有“自知之明”,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明确提出自己写作的两项准则:一、“寻求一种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健全视线”;二、“寻求对于基督教国际的与跨文化关系的真实经验的理解,包括帝国主义的成见与亚洲人及发达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主义的理解”。贝德士早在三十年以前即已发表这样的高见卓识,应该成为我们现今撰写中国基督教史的奋斗目标。

家峰原先已对贝德士文献有所接触与了解,1999 年冬又为搜集学位论文资料专程前往耶鲁检阅相关卷宗。他惊讶地发现,这位美国老前辈早已把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列为那部未完成的大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此写下长达一百五十多页的“工作稿(working drafts)”,是根据时间和逻辑顺序对各种相关资料的摘录与评论。此外,他还为这一部分书稿的写作积累了许多原始资料的摘录(有些是复印件)。根据我的阅读笔记,贝德士为《基督教奋进在中国社会 1900—1950》一书拟定的写作提纲,其第三部分(1922—1937)之第七章“布道与宗教振兴”列有“农业地区”专节;第十章“服务”列有“农业服务”(包括教会服务与农业教育);第四部分(1937—1950)之有关章节(原稿编号为 B2、B10),也列有“农村教会及其服务”等相关内容。因此这些摘录资料针对性很强,至少可以为现今中国基督教农村布道研究者提供极为珍贵的检阅线索。

家峰的耶鲁之行,重要的收获不仅在于资料,可能更为受益的还是以最近距离认知了一位史学大家的研究与写作过程,而这是很难通过他人口头或文字介绍能够深切感受的。只要把家峰的学位论文与现今的书稿稍加对照,便可看出他已经受到贝德士宏大叙事的影响。他没有就事论事孤立地叙述中国

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而是把这个运动与社会福音及世界农业传教运动联结起来，放在一个更为宽阔的时空来加以观察。同时，他又深入探讨基督教乡建与全国乡建的联系，特别是与教育界的乡村建设之间的关联与同异。他既追述了农业传教士早期的乡村工作，更着力论述了基督教乡村建设乃至乡村牧区理念的正式形成与发展，乃是教会对于多种中国乡村挑战的回应……凡此种种，都正如贝德士所一贯倡导的，既要重视世界背景，更要发掘“中国因素”。

作者没有满足于总体的宏观叙事，他还为我们提供了樊家庄、淳化镇、黎川三个乡村建设实验区的个案研究资料，通过这3个不同类型的个案，将可更为增进我们对于基督教乡建运动的具体了解。正如作者所言：“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以自立为目标的乡村教会建设运动，教会试图通过参与乡村社区生活，把自身从社会边缘地位，拉向乡村社会的中心，建设真正的中国本身教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次推动教会本色化发展的实践运动。”

尽管作者深刻地阐释了这个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但相关史事陈述却是极为客观而平实的，没有任何的渲染或夸张。改造占人口80%以上的中国广大农村，世俗乡建派早已显示出事与愿违、力不从心，基督教乡建派则更加困难重重，因为他们还要承担额外的“基督化”任务。作者既记述了基督教乡建工作者的理想、热诚、毅力与辛劳，同时也如实揭示出他们的局限与弱点。作者不无遗憾地指出：“基督教乡建运动的理念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如果以乡建运动所取得的实际成绩与所宣称的目标相比，可以说基督教乡建运动是失败的，即使在小范围内的实验，其成功的例子也不多见，尤其是在‘基督化乡村社会’的目标方面。”

但是作者并不认为这是基督教乡建派个人的无能或失误，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农村改造的艰巨性(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基督化)估计不足，贸然承担起力不胜任的重担，并且轻率提出一些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景。同时，他们自身也无法缓解福音传播与社会重建之间的张力，因而更使运动陷入极其尴尬的两难困境。不过，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前驱者改造中国农村的善良愿望，他们为理想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还有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仍然是我们至今在农村工作中可作为借鉴的历史遗产。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无论就基督教史还是乡建运动史而言均属薄弱环节，至今仍然处于极端艰苦的拓荒时期，家峰在这方面已经付出辛勤劳动并且取得明显成绩。我希望有更多年轻学者勇于开疆辟土建功立业，因

此才匆匆忙忙赶写此序。不当之处，尚祈各方先进不吝教正。

章开沅

2006 年深秋于桂子山

目 录

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社会福音与世界农业传教运动	(14)
一、美国社会福音思潮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14)
二、世界农业传教运动	(22)
第二章 农业传教士与基督教在华早期乡村工作	(29)
一、被差会忽视的乡村和乡村教会	(29)
二、农业传教与基督教农业高等教育的兴起	(33)
三、农业传教士对教会乡村化的提倡	(38)
四、以金陵大学为中心的农业推广与基督教早期乡村工作	(49)
第三章 挑战与回应：基督教乡村建设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62)
一、基督教面临的乡村挑战	(63)
二、基督教会的回应	(76)
三、乡村牧区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87)
第四章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概况(1927—1937)	(100)
一、两种分歧的路线？	(100)
二、教会界的乡村建设	(103)
三、教育界的乡村建设	(111)
四、基督教乡建与全国乡建之联系	(129)
第五章 基督教乡村建设的个案研究	(133)
一、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与樊家庄乡村实验区	(133)
二、金陵神学院与淳化镇乡村教会实验区	(143)
三、徘徊于政治与宗教之间：基督教江西黎川实验区	(160)

第六章 变动时代的基督教乡村建设(1937—1950)	(180)
一、抗战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建设工作	(180)
二、战后乡建复员与新时代的基督教乡村建设	(193)
第七章 结语:世俗与神圣的两难	(202)
一、基督教对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贡献	(202)
二、基督教乡村建设对中国基督教运动的贡献与影响	(204)
三、基督教乡村建设:世俗与宗教之间	(207)
四、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遗产	(210)
外国人名汉译对照表	(215)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30)

時言

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前锋，民众解放运动的首创者，不是他自己（指晏阳初——引者）和他的同工，也不是一般所谓主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那些真正开始把自由的种子散布在中国的民间，把一般民众的痛苦引为自己的责任，从而为他们效劳奔走为他们找出路的，乃是那一班筚路蓝缕，开创基督教道的初期宣教士。①

这是1933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孙恩三笔录的一段晏阳初的演讲。这年4月7—20日，协进会在以乡村建设闻名中外的定县召开了基督教乡村建设讨论会，主题为“基督教对乡村建设应当有何贡献”，共有十四个省份、十八个教会团体的一百八十六名代表与会。晏阳初为教会代表共作了三次演讲，勉励教会追随前辈，为中国的乡村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孙恩三认为晏阳初的论调并非是“一种口头的恭维，一种场面上的应酬，乃是一种真切的信念的流露”。^②

乡村建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可谓“轰轰烈烈”，乃至被称为一场“运动”。据当时统计，约有七百个公私团体致力于乡村工作，建立的各种实验区多达一千余处，可谓盛极一时。最著名的莫过于晏阳初所领导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

^① 孙恩三：《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呐喊》，载《中华归主》第一百三十八期，识字运动专号（1933年9月1日），第3页。晏阳初三次演讲记录刊在《金陵神学志》第十五卷第五期（1933年5月），第8—14页；曾收入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第507—515页。

^② 同上引孙恩三文。

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梁仲华、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省立民众教育院,中华职业教育改进社在徐公桥一带的乡村实验以及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等等。在乡村建设运动史上,有许多领袖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活动都与基督教关系密切,如晏阳初、陶行知、许仕廉以及平教会其他领袖如傅葆琛、李景汉、陈志潜、谢扶雅等都是知名的基督徒。平教会的工作更是源于晏阳初 1920 年从欧洲回国时在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平民教育科。如晏阳初所言,基督教是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但到目前已出版的有关乡村建设的研究论著,却很少提及基督教的角色。^①

本书即以“基督教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基督教与近代乡村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所从事的乡村建设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这里提到的“基督教”,专指新教(更正教),不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天主教比新教更重视在乡村的工作,但其重点更多地放在传教和“引人归主”方面,而对乡村服务和乡村建设工作则兴趣不大。在目前所见资料中,很少看到关于天主教乡村工作方面的报道。因此,本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新教方面,包括基督教会及其团体(如男女青年会、教会大中学校、神学院等)所兴办的乡村建设活动。

晏阳初、陶行知、徐士廉等一大批从事乡村建设的领袖和骨干,尽管他们都是热忱的基督徒,以“宗教家的精神”去服务社会,^②但他们的工作无论从理念到实践,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并没有传播基督福音和建设教会的意图。也有部分传教士在非基督教性的机构如华洋义赈会等从事乡村建设的工作,这些都不属于本书研究的“基督教乡村建设”的范畴。

二、学术史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有关乡村建设的史料堪称丰富,仅当时出版的论著也有上百部,各类报刊文章更不计其数。但学术界对 30 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系统研究并不算多,这与乡村建设运动在近代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很不相称。最近二十年国内外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主要集中在晏阳初、梁漱溟等这些名

^① 最近的著作有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该书主要以晏阳初、梁漱溟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实验为重点,也考察了无锡、徐公桥、乌江、镇平等江宁实验区。乌江实验区属于教会大学的金陵大学主持的实验区,但该书并未涉及基督教所从事的乡村建设。

^② 毛泽东在 1938 年曾表示,对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见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400 页。

人及他们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实验方面,^①而对中国基督教的乡村建设,仍关注甚少。在这方面,海外学术界则领先一步。

由于来华传教士充当了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主要角色,有关方面的研究往往也是他们开辟的。贾尔森(Arthur L. Carson)是一位在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从事乡村工作的传教士,后去齐鲁大学主持乡村建设工作。1929—1930年他对世界各地的236名从事乡村工作的传教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包括在中国的62名传教士。调查内容包括各国的农业条件、乡村工作的种类、目标和计划、农业教育和人才培训等。在此基础上他在康乃尔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传教:以236名传教士和其他乡村工作者的经验为基础的研究》(1933)。^②这篇论文从当时乡村工作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出了世界各地区通用的一些原则性指导意见,比如,与当地社群的合作、集中资源的工作方式、基督教服务的立场等,这些原则在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也一再被强调。

胡本德(Hugh W. Hubbard)是河北保定华北公理会传教士,也是华北基督教乡村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他和夫人(Mabel Ellis Hubbard)主持的保定樊家庄乡村实验区在抗战前闻名海内外,后毁于日军入侵。胡本德夫人在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读书时,以自己和丈夫主持的保定樊家庄乡村实验为素材,完成了名为《在中国樊村通过生活来传扬基督教的实验》(1938)的硕士论文。^③严格来讲,这更像一篇工作总结报告而非学位论文。作者详尽叙述了他们在樊家庄进行教育、卫生、经济、宗教等各类工作的具体情形。作者得出的结论诚如标题所示,即基督教是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成功地传给村民的。这篇论文不仅对了解乡村建设的具体工作方法很有价值,对研究乡村建设如何达至宗教目标也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标本。

美国著名乡村教会专家费尔顿(Ralph A. Felton)在1936至1938年曾到日本、朝鲜和中国等地调查访问,并在金陵神学院做访问教授,期间完成了《远东

① 近年来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黄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勇:《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吴相湘:《晏阳初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1年;宋恩荣:《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Charles W.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前引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等。

② Arthur L. Carson, *Agricultural Missions: A Study Based upon the Experience of 236 Missionaries and Other Rural Workers* (New York: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Religious Research, no date, about 1933), p.107.

③ Mabel Ellis Hubbard, *An Experiment in Teaching the Christian Religion by Life Situation in Fan Village, China* (M.A. Thesis, Oberlin College, 1938), p.87.

乡村教会》一书(1938)。^①该书比较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乡村教会及乡村工作的异同，并根据这些国家的不同历史文化条件提出他对教会乡村工作的建议。

费尔顿曾长期执教德儒大学神学院，并在神学院创办乡村教会科，为各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也有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有两本与中国乡村建设相关的著作皆为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一本是杨昌栋著的《福建平潭县教会工作计划：基于对美国 27 个成功的乡村教会和其他乡村服务组织的研究》(1935)，^②该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作者把美国乡村教会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仔细梳理，然后加以变通，应用到作者家乡的教会。

另一著作是谢景升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乡村建设：问题和方法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政府和基督教会的建议》(1944)。^③该文很长，共 515 页，未能出版。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乡村条件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对当时乡村建设方法的研究，最后一部分是对战后中国乡村建设的建议，其中提到了教会在战后乡村建设中应起到的作用，除此之外，这篇论文却很少提到基督教的乡村建设。

有一本关于基督教乡村建设的文献汇编值得一提。1944 年，美国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肯尼迪传教学校班的学员对各地教会期刊发表的有关农业传教的论文进行评估，最后挑选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 42 篇文章，由 Arthur T. Mosher 编辑而成《乡村传教文献》(第一卷，1944)。其中很多文章出自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国际宣教评论》)、*The Chinese Recorder* (《教务杂志》)，作者几乎包括所有当时活跃在一线的农业传教士和乡村工作者，涉及的地区也很广泛，包括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④

以上都是用英文撰写的。早期中文著作也都是由参与基督教乡村建设的

① Ralph A. Felton, *The Rural Church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1938), p. 215 中译本名为《基督教与远东乡村建设》，1940 年金陵神学院出版。

② Chang-tung Yang, *A Program for the Church of Ping-tan Hsien, Fukien, China: Based on a Study of Twenty-Seven Successful Rural Churches and Other Rur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nghai: Kwang Hsueh Published House, 1935).

③ Ching-sheng Hsieh,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Problems and Methods with Suggested Policie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for the Christian Church* (Ph. D. dissertation, Drew University, 1944), p. 515.

④ Arthur T. Mosher, ed., *Source Book of Rural Missions*, Vol. 1. (New York, Agricultural Missions, Inc., 1944), p. 235.

教会人士所撰。1940年金陵神学院出版了朱敬一的《一个实验的乡村教会》，^①作者是中华基督教教会南京区会的牧师，曾主持金陵神学院在淳化镇举办的乡村教会实验区，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该实验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教会增长的经验。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教会为中心进行乡村建设的个案，对今天的研究颇具资料价值。

1943年金陵神学院又出版了《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作者余牧人是金陵神学院的教授，对乡村教会的事工很有研究，也有乡村工作的丰富经验。该书篇幅不大，约5万字，对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和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分别作了概述。作为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局内人，他在该书中也以很大篇幅阐述了对以后乡村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上这些著作都是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进行期间完成的，著作者大都具有乡村教会工作的亲身经历，或者本身就是乡村教会领袖，因此这些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工作报告、方法探讨或咨询建议的性质，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实践性。虽然它们也都以学位论文或研究著作的身份问世，但以今日纯粹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其局限甚至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余牧人在他的书中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如果要实现再造民族和复兴国家的目的，“非从基督教寻求新的力量，发现新的理想不可”。很显然，他夸大了基督教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就连为该书作序的燕京大学教授、同时也曾是教会乡村工作领袖的徐宝谦也对此略有疑问，希望他能详加说明，以使“教外同志从事乡村建设者闻之心折”。^②但这些作品并非不重要，相反，它们都是今天研究基督教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来源，甚至著作者本人也都成为现在研究的对象。

据目前笔者所见，对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真正学术研究，还是从五六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刘广京呼吁加强在华传教士的研究开始。威廉·布朗在哈佛大学1955年发表了《中国基督教乡村运动，1920—1937》一文。该文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乡村计划、基督教农业教育、乡村教会的事工重点、人才和经费三个大的方面，对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作了全面评述，并以南京淳化镇乡村教会实验区为个案，展示了一个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基督教方案及所取得的成就。作者认为基督教最早认识到中国乡村问题并采取了行动，他们的计划也是超前的。但不幸的是，基督教本身存在着组织结构、教

^① 朱敬一：《一个实验的乡村教会》，成都：金陵神学院，1940年；香港：圣书公会，1954年。

^② 余牧人：《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上海：广学会，1943年，“徐序”，第1页。

义和政策上的缺陷，削弱了应对中国乡村挑战的能力。^①然而这不失为一篇关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的开荒之作。

另一篇重要的论文是蒙根森(William James Megginson III.)在1968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农业工作，1911—1937》(1968,未刊)。笔者1999年冬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文献中发现这篇论文，但由于当时时间和调档不便，当时只看了贝德士为这篇论文所做的长达109页的摘抄(原文277页)，2003年夏再次赴耶鲁查阅贝德士文献时，才得以看见原文。^②贝德士当时正致力于《新教在华奋进六十年》(*The Protestants' Endeavors in Chinese Society, 1890—1950*)的写作，传教士在华乡村工作是该书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1978年去世前已为之作了大量的资料准备，蒙根森的论文摘录即其中一例。贝德士在这篇摘录中插入不少评论，比如，他认为“这是一篇值得称赞的论文，它充分利用了美国的主要英文材料，但对基督教早期(乡村)工作和形势的了解不够完备”。贝德士凭借他对中国基督教史资料的熟稔，对该文不准确的材料和论点也一一指出。该文按历史年代顺序，考察了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认为1924年是基督教转向乡村工作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到1933年基督教开始进入“乡村建设”阶段。作者对三个重要的基督教乡村建设实验区也都作了论述。在结论中他强调了美国传教士的乡村建设工作领先于政府，成为国家在农业高等教育、研究、合作和灾荒救济方面的示范。他也批评了基督教传教运动从整体来说，并没有注意到农村的需要，以及对农村工作的转移。^③这篇论文和贝德士的评论对我们了解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有很大的帮助。从作者文后所列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该文写作完全靠英文资料，没有中文资料。正如该文标题所示，该文研究是以美国传教士为中心，而对参与乡村工作的中国教会人士有所忽略。在乡村工作早期，这基本是正确的，但到后期，尤其是30年代全国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发展之时，虽然在某些乡村建设实

① William A. Brown, "The Protestant Rural Movement in China, 1920—1937", *Papers on China*, 9: 173—202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55). Reprinted in Kwang-ching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6), pp. 217—248.

② 贝德士文献目前保存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关于贝德士文献的内容与价值，可参阅章开沅：《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载章开沅、马敏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贝德士博士是章开沅先生1946—1948年在金陵大学读历史系时的老师。

③ William James Megginson, *The Rural Work of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11—1937* (M. A. Thesi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68). 见于贝德士文献，编号(Record Group)为10, 第8盒，第278卷，简写为RG10-8-278。以下同。

验区传教士还在发挥主导作用,但总体上,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已成为中外基督徒合作的运动,有些实验区甚至完全是由中国信徒独立进行的。另外,该文把基督教乡村运动基本上看成是世俗的运动,淡化它对于基督教运动本身的意义。因此,作为对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全面研究,该文仍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

到 80 年代,关于基督教乡村建设研究的专题研究著作逐渐增多,重要的中文著作有如下三篇:一篇是台湾卢孝齐在 1985 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以华北地区为例(1922—1937)》(1985)。^① 作者勾勒了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酝酿、发展过程,并把华北基督教分成教会界、教育界与社会团体界,分门别类地阐述了他们的乡村建设工作内容。论文最后对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评估,认为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运动没能实现“中国基督化”和“基督教中国化”的目标,并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其中原因:内在原因有乡村建设思想与理论的不统一、方法与计划、人才训练缺乏等;外在原因有政治(日本侵略等)、社会经济及历史因素等。该文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起源、乡村建设理念的发展及与基督教运动之间的联系缺乏更进一步分析,史料运用比较单一。

一篇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撰写的《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理论与组织基础》。^② 全文共有四个部分,前三部分讨论了“社会福音派”与耶稣形象的重塑、国家主义话语构造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福音派”与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结合,最后一部分以金陵神学院南京淳化镇乡村教会实验区为个案,分析了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中世俗价值与宗教价值的冲突与紧张。作者引用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庐克曼(T. Luckman)关于教会世俗化行为取向破坏其自身“意义构造”的理论,认为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以其宗教性的日趋衰微为其代价的”;“乡村建设运动伴随着教会自立自养的命运节奏而兴起,当它把扩展的力量真正达于更广泛的社会范围之内时,其宣道工作与福音传播却受到了专门化机构与政治威权的消融与阻滞,使其无法维系属灵的纯粹性,从而造成整体性的乡村建设运动完全以世俗化的结果与面目而终结,社会的基督化最终以基督的社会化形式变相完成了自身的使命”。^③ 这是一篇理论色彩很浓的论文,作者提出了很

①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指导教授为前齐鲁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杨懋春,未刊。

② (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编:《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八期(1998 年春季号),第 253—302 页。

③ 《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理论与组织基础》,第 281、302 页。

多有价值的命题，并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作出阐释。稍嫌不足的是，作者在史料辨认方面存在误判，如把晏阳初定县平教会的乡村建设也看成基督教乡村建设，导致以此为基础的理论诠释结论缺乏事实支撑。

另一篇论文是香港学者陈广培博士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基督教的意义建构与在农村中角色建构的企图》，该文可以看作是对杨念群一文的商榷。作者认为杨念群引用卢克曼的理论解说乡村建设运动是不恰当的，因为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情形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宗教情况。陈不同意杨文中关于世俗化过程“破坏”宗教“意义结构”的论点，认为这一世俗化的过程不单是消极的“意义结构”的破坏，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意义建构”的过程，即基督教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塑造“农民耶稣”的形象，建构了“基督徒面对中国语境与基督信仰时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陈文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权力”概念，指出乡村建设运动是教会以另一种形式去建立或扩展其在乡间社会权力角色的企图。

除以上三篇专题论文外，有关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中文论著中也间或涉及这一课题，如顾长声先生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他把基督教乡村建设解说成基督教“同共产党争夺农民”，是以反共为中心，扩大教会在农村的势力，把教会进行的乡村调查说成“情报调查”。^①这种定性研究显然失之于偏颇和简单化，不过该书出版于1981年，这种论点完全可以理解。近年来关于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中多有提及乡村建设，如陶飞亚、刘天路教授合著《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有专节论述齐鲁大学的乡村建设计划。作者认为齐鲁大学的乡村改良，根本上讲是方向错了，必定要失败。^②史静寰教授在《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一书中对燕京大学的乡村建设活动作了分类，一类以社会学系为核心，具有教学、研究性质的乡村建设；一类以基督教团契为代表，体现基督教精神和慈善性质的乡村实验；还有一类以爱国学生为团体，志在宣传抗日的农村工作宣传团。^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夏军女士对金陵大学农学院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做了研究。^④有两篇硕士论文涉及基督教的乡村建设，一篇是潘敏对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研究，一篇是罗兴连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6—330页。

②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4—264页。

③ 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46页。

④ 夏军：《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乡村建设运动》，载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3—400页。